

儒家的教與學

唐端正

現代學校教育著重工具理性，主要教學生知識技能。至於價值理想、道德操守的問題，則委之於宗教。儒家立教，雖非反智，但並不以知識技能為主，而首重倫理道德。故孔門四科，以德行為第一。顏回不遷怒，不貳過，孔子便說他好學。（《雍也》）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的君子，孔子也說他好學。（《學而》）故夏商周三代共通之學，孟子以為「皆所以明人倫也」（《滕文公上》）。

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，其實都是道德理想。就《大學》言，內聖先修己的事，工夫為格致誠正，外王為治人的事，工夫是修齊治平。實則成己便要成物，立己便要立人，內聖與外王，是一以貫之的。要成就內聖外王的理想，便必須突破小己的生命，與民物通而為一，做到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」（宋張載語）的境地。而且只有如此，達致窮理盡性而至於命的境界，才算成德。

儒家的道德教育，著重點出我們主體生命中的道德根源。此即孔子所指的仁心，孟子所指的善性。儒家以為道德根源不在於上帝的權威、先知的誠命或外在的律法，而是本乎我們的良知善性。道德的踐履是踐仁盡性的事。忠孝等德目固然有它的社會價值，但儒家教忠教孝，主要是由於盡忠盡孝才能踐仁盡性，使我們的人格得以完成。孟子云：「舜於畎畝之中，天下之士多就之者，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。為不順於父母，如窮人無所歸。天下之士悅之，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憂；好色，人之所欲，妻帝之二女，而不足以解憂；富，人之所欲，富有天下，而不足以解憂；貴，人之所欲，貴為天子，而不足以解憂。人悅之、好色、富、貴，無足以解憂者，惟順於父母，可以解憂。」（《萬章上》）可見行孝是使我們的生命得以調適上遂、人格得以完成的內在要求，與任何外在權威、客觀要求無關。今人為了要達到子女照顧父母的目的而提倡孝道，不肯定人有良知善性、道德自覺，一味以權威政令來推行忠孝之道，這決不是儒家教忠教孝的原意。同理，儒家認為：「禮樂之說，管乎人情。」（《禮記·樂記》）「禮樂之統，管乎人心。」（《荀子·樂論》）禮教、樂教，亦必須扣緊我們生命主體的仁心善性。否則徒有俎豆玉帛、干戚鐘鼓，亦毫無意義。故孔子說：「人而不仁如禮何，人而不仁如樂何。」（《論語·八佾》）

許多人以為儒家既然重視我們生命內在的道德自覺，便忽視客觀的文物形式。實則儒家不但重質，也重文，文質並重。故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

彬，然後君子。」(《論語·雍也》)又曰：「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。」(《顏淵》)故儒家的禮樂教化特重人在禮文制度、客觀形式中陶冶性情，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。

禮教雖本於仁心，但亦必須有種種儀仗禮器、周旋進退之節，才能使禮意表現無遺。故欲明君臣之義，便有朝覲之禮；欲使諸侯相尊敬，便有聘問之禮；欲明臣子之恩，便有表祭之禮；欲明長幼之序，便有鄉飲酒之禮；欲明男女之別，便有婚姻之禮。而冠禮則為責成人之禮，蓋冠然後服備，服備然後容體正，顏色齊，詞令順，達到正君臣、親父子、和長幼的目的。這都和許多衣服器物、禮節儀文有關。可見儒家的德教，是情文俱盡、心物相通的。今人一面批評儒家禮儀三百、威儀三千為繁文縟節；一面又說儒家只有抽象說教，而缺乏客觀踐履的途徑。不但妄自菲薄，而且厚誣古人，對儒家立教，並不了解。

再就樂教言，儒家是要用音樂來陶冶性情。樂固然亦本於內在的心志情思，但內在的心志情思，必須表達出來，為了表達心志，便要發言為詩，言不足以完全表達，便要長言之(長言就是詠言，亦即是歌)，長言之不足便要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，則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故詩言其志，歌詠其聲，舞動其容，然後配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等樂器、干戚羽旄等道具，詩歌舞一起交響合奏，然後內在的心志情思才能表現無遺，感動人之善心，風化天下，達到「情深而文明，氣盛而化神」的目的。

儒家立教，除了文質並重、道器並重外，還有學思並重。格物的工夫雖不必如朱子所謂，但即使是多識鳥獸草木之名，也是孔子所肯定的。《論語》開宗明義是「學而時習之」，《荀子》第一句是「學不可以已」。孔子不但是位偉大的先師，而且也是一位偉大的學生。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，自言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」又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」(《論語·述而》)知仁勇雖然是一種德目，亦必須以好學來輔助它。所以孔子說：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(《論語·陽貨》)

雖然孔子在《衛靈公篇》和荀子在《勸學篇》都有「終日而思，不如學也」的話，但並不等於說他們不重視思。只能說他們都是學思並重的。思是理性的思考，從外面學來的東西，必須通過我們理性的審查、批判、調和、整理，才能成為系統的知識，有助我們達致內聖外王的理想。所以孔子說「學而不思則罔」(《為政》)，又說他的學問非多學而識，而是「一以貫之」(《憲問》)。荀子也說：「聖人者，以己度者也。故以人度人，以情度情，以類度類，以說度功，以道觀盡，古今一也。類不悖，雖久同理。」(《非相》)孟子更說：「心之官則思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」(《告子上》)由此可見儒家學思並重之一斑。

孔子施教，「有教無類」(《衛靈公》)，曰：「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」(《述而》)《論語》載孔子見互鄉童子，門人以爲其人習於爲不善，不當見之。孔子言人潔已

而來，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，亦不能保其退而爲不善，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。

又儒家施教，均有特定之對象，其目的在使對方開悟受益，必須因材施教，當機說法，而非以發表一己之理論爲目的，作一般性之演講。故孔子對不同學生問同一問題，可以有不同的答案。如子路問「聞斯行諸？」由於子路好勝，孔子便答以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」。及冉求問「聞斯行諸？」由於冉求爲人退弱，孔子便答以「聞斯行之」(《先進》)。其餘問仁、問政、問孝等亦然。

在因材施教時，不但要因就對方才性，也要因就對方的程度。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」(《雍也》)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」(《衛靈公》)對方心求通而未得，然後開其意，口欲而未能，然後達其辭。所謂：「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(《述而》)《禮記·學記》云：「善問者如攻堅木，先其易者，後其節目，及其久也，相說以解；不善問者反此。善待問者如撞鐘，叩之以小者則小鳴，叩之以大者則大鳴，待其從容，然後盡其聲；不善答問者反此。」《荀子·勸學》亦云：「問楛者，勿告也。告楛者，勿問也。說楛者，勿聽也。有爭氣者，勿與辯也。故必由其道至，然後接之，非其道則避之。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，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，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。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，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，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。」以上可見儒家權宜施教、方便說法的一斑。

儒家既要對特定的對象權宜施教，而非作抽象的說教，故對每一個學生的特長個性，亦必須知之甚稔。孔子云：「由也果……賜也達……求也藝。」(《雍也》)「師也過，商也不及……柴也愚，參也魯，師也辟，由也嚆。」(《先進》)我們除了可在《論語·子罕》看到子貢、顏淵讚嘆孔子的話外，孟子也說：「宰我、子貢、有若智足以知聖人。」(《公孫丑上》)可見孔門師弟之間，皆直接與對方人格相照面。這種「學莫便夫近其人」(《荀子·勸學》)的教學特色，實有合於西方的導師制度，值得我們參考。